

明清以来 苏州城市社会研究 上

唐力行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
研究丛书

唐力行 主编



明清以来 苏州城市社会研究 上

唐力行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唐力行主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7

(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唐力行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0744 - 8

I. ①明… II. ①唐… III. ①社会史-研究-苏州市-
明清时代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5341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装帧设计 储平

技术编辑 吴放

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

唐力行 主编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47.75

2013 年 7 月第一版 201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744 - 8/K · 107

定价: 9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总 序

唐力行

近 30 年来，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学术前沿，人们希望通过对各个区域社会历史的深入剖析而获得对中国整体史的新认知。在众多的区域中，江南社会历史尤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青睐。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学界虽无统一看法，但大致可包括今日之苏南、浙北、上海与皖南，其核心则为苏、松、常、嘉、湖、杭、徽地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与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区域内有六朝古都金陵、南宋古都临安、明清都会苏州以及今天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近代以降，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汇，开始了中国区域社会最早的近代转型。今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以传统的江南区域为核心发展而来的。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社会的学术潮流兴起于 20 世纪前半期，百年来学者对江南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所涉及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徽商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 30 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经济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鸿篇高论，不胜枚举，可谓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令人目不暇接，

研究水平之高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望其项背的。

我们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当下的关心。中国近代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缠绕纠葛中进行的,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特色。历史学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色。江南社会历史还有着诸多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幽索微。江南研究也引起海外汉学家的关注。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中缺乏理性的经济团体和自治的公民社会。这一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到了清代,中国经济的成长已经跌入了“陷阱”,没有外力的推动,难以自拔。黄宗智有关江南农村内卷化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指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他比较了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认为江南经济似乎略有优势,只是在19世纪两地发展才出现了大分流。这些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提醒我们,江南研究,不仅需要运用大量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只有掌握了理论话语的主导权,才能使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学术水准。我们希望通过构筑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平台,包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杂志,以及每年主办一次江南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以江南社会史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已形成以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长时段与短时段研究相结合、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注意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我们与海外学者合作编纂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资料集,在勉力于江南研究基础工程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出版了《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江南儒

商与江南社会》、《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近代上海黑社会》等研究论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近年来我们在学科建设上也有所发展，建置了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并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2008 年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市重点学科（编号 S30404）与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编号 SJ0703）为我们出版《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衷心希望丛书能为海内外江南研究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资深学者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提供一片圣洁的学术园地，共同为繁荣江南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导 言

唐力行

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清时期更是成为称雄天下的商业大都会。苏州文化昌盛，市民文化独领风骚，就连状元也成为本地土产，明清状元总数达 34 名，清代状元占全国的 22.8%。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使苏州的社会生活瑰丽多彩，其社会变迁往往得风气之先。苏州城市社会研究已成为海内外显学，盘点已有的研究成果，起点已是很高，要在这个领域有所推进，实为不易。1994 年我调至苏州大学历史系工作，任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开始有计划地开展苏州城市社会史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从苏州碑刻资料的整理开始的，遍布古老苏州大街小巷的碑刻，虽然已经斑驳陆离，字迹漫漶，但是却留给我们大量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的信息。1998 年《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我的第一篇关于苏州的学术论文《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发表。碑刻资料的整理由我与王国平教授共同主持，博士生吴建华、徐茂明，硕士生吴志远、申浩等参加了搜集、整理、标点、校勘的过程。一支苏州研究的基本队伍带出来了。他们中有人参加了我的国家社科项目：苏州与徽州区域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2007 年《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 世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还与著名的江南史研究专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忠平先生合作主编了《江南区域

史论著目录（1900—20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这些工作为指导研究生准备了较为充足的条件。

一批优秀的博士论文相继出版，如吴建华教授的《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徐茂明教授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罗婧教授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安涛教授的《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以金山县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吴琛瑜博士的《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周巍副教授的《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相比较而言，硕士的学习时间短，做小的专题研究最为合适。从1996年我在苏州大学招收的第一个硕士吴志远开始，直至2010年入学的周子扬，共有13位同学撰写了有关苏州城市社会史的硕士论文。这些论文意在拾遗补缺，深入探讨苏州城市社会某一行业或社会群体、街区或慈善事业、家族或文化信仰。每一篇文章，看似零碎，却又映照着苏州社会的整体，体现了苏州人文的特色。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他们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从整体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下面我对这些论文作一简介：

本书开始的三篇论文都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苏州的行业，涉及壅业、邮递业和典当业。壅业经营的是粪肥的买卖，向不为学人所关注。吴志远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源于参与整理苏州碑刻，我们在常熟碑刻博物馆抄录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常熟县正堂示禁粪行碑》。碑文告诉我们的政府对壅业管理有着粪草行帖、牙户、行场等制度。行场设于河埠头，牙户收集的粪便在场与农船交易。农船到行，行主要立即采办，不能拖延以误农工。行主还要供应饭食。从碑刻可知，壅业是联系城乡的中介，关系着城市卫生和乡村肥料。通过商品经济这只无形的手，解决了城乡这两大问题。但是，壅业运营的过程中也存在种种弊端，碑文披露“奉牙厘局宪批：查核所复牙户叶桐生一人请领粪草行帖十二纸之多，并不开设行

场，招集无赖，朋充顶替，四出兜揽，分占各埠码头，遇有粪船，任意勒索。并有项柳汁青等三行，亦系一人兼充，同恶相济。似此藉帖垄断，农民何堪扰累！应如所请，即将原领帖示一并涂销，以示惩戒，候将缴到部帖告示，汇案详销。此外陈□泰等各行，既据查明，尚无兜揽索扰情弊，姑宽免于呈销，仍准照常开设，以示区别。即由县给发示谕，飭令勒石河干，永远禁革。倘有占埠索扰农民，随时严办，仰即遵照办理毋违，等因。当经传谕各牙户遵照在案。兹据牙户曹正兴等稟请勒石示禁等情，前来。除批示并将帖示当堂给发外，合行给示，勒石谕禁。为此示”（《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474号碑）。社会生活是复杂而又丰富的。传统时代，居民密集的城市，粪便的清除对城市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敏锐地感觉到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与城市近代化关系这一课题的前沿性。我建议志远，去苏州档案馆查阅苏州壅业的资料，把壅业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史视野和更为深远的社会变迁的视野加以考察。在档案馆的支持下，志远得以阅读了民国年间苏州壅业的56卷档案，并最终决定以壅业研究为硕士论文。志远从市场机制下城市环境卫生与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的角度，探讨清代、民国年间的苏州壅业。根据他的研究，壅业公所成立于1913年，该组织具有业缘与血缘双重特征，在与官府的控制与反控制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作方式。壅业公所具有维护城市卫生环境、承捐纳税、保护产权、打击偷盗等功能。苏州市政当局以壅业组织为中介，发挥行业自我管理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环卫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政府可以引导并利用类似壅业组织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公共事务，从而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处理好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不要取多予少，更不要越俎代庖，阻碍中介组织的发展与运作。

苏州的邮递业一文，告诉我们明清以来苏州逐渐成为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一个中心，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为适应与各地往来通信、交流的需求，苏州民信局亦非常发达。民信局亦称“民局”，是中国民间各种通讯组织的总称，包括经营国内通讯的民信局和专营华侨批信批

款的批信局。1896年苏州设立新式邮政系统后，作为传统寄递组织的民信局在苏州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后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寄递系统在合作、竞争的过程中，新式邮政以国家为后盾，采取多种措施，逐渐挤压民信局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民信局则以苏州商会为依托，通过商会请求延迟取缔民信局。最终，随着国家权力的日益集中，邮权统一的要求，交通部于1934年强令取缔民信局，苏州民信局也自此消亡。周子扬同学以苏州民信局与大清、中华邮政等官办邮递业的关系为切入点很好地考察了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传统与现代、国家垄断与自由竞争等问题。

子扬完成论文的过程，自有一段心路历程，她说：“2010年9月我跟随唐老师开始了我的硕士生涯，开始的大半年，唐老师主要指导我阅读关于史学理论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这些方面的论著，希望我能打好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生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学之后，唐老师开始让我关注苏州，这是因为苏州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近代随着上海开埠，苏州逐渐没落，因其毗邻上海，难免会受到上海现代化气息的影响，而其传统的文化底蕴仍然十分强大，这二者之间的交流碰撞，使得苏州在近代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典型性，研究苏州近代历史也就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在唐老师的指导下，我首先利用图书馆找到关于苏州历史的通史、论著以及相关的论文，使我能够了解当前苏州研究的现状，其中我按唐老师要求重点研读了《苏州府志》、《吴县志》，对苏州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在此基础上，2011年4月我听从唐老师的建议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和苏州市图书馆查找资料，在苏州市档案馆，我翻阅了档案资料目录，并结合之前所了解到的关于苏州研究的概况，初步确定了几个备选的课题。回去之后，我向唐老师征求意见。唐老师告诉我选题应具备以下几个前提：一、要有支撑论文的核心资料，这是最根本的条件。二、选题的充足理由应该是填补前人留下的空白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根据这两点，我梳理了在苏州查到的资料情况，把论文选题确定为研究民国时期苏州邮政与苏州民信局博弈的历

史过程。理由在于一方面苏州市档案馆的邮政档案十分丰富，满足了选题的第一个前提，另一方面是国内对于邮政和民信局历史的研究还很薄弱，尤其是关于邮政与民信局博弈的过程仅有少量的论文提及。确定论文选题之后，我开始着手搜集关于研究邮政以及民信局的专著、论文、资料选辑等。在这个过程中，唐老师给我的建议是对资料的搜集不能局限于传统史学典籍，要从民间文献如碑刻、日记、文集、笔记、地方志、小说等等中寻找史料，还要作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要学会对史料进行辨伪和考证。于是2011年暑假期间，我前往苏州市档案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处收集资料，收获很大。资料问题解决以后，就是如何确定论文的框架结构问题。唐老师给我的启发是：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脱离当时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区域是整体的一部分，首先应梳理当时的社会背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以苏州邮政和苏州民信局关系演变的全过程为主线，探讨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的邮政系统如何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逐步取代传统的民间传信系统。以这一点为切入口，关注传统和现代并存的问题以及国家垄断和自由竞争的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是应关注历史过程中的人和事，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同时，要做好表格的制作和地图的绘制。老师的教诲和启发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终生受用”。三年辛苦不寻常。子扬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与大多数同学有共同之处，因此我将其移录于此。

典当业是经营动产抵押贷款的一种金融机构，关系到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而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行业。苏州典当业在传统时代很为繁盛，清季以来，江苏旧有六百余典，苏属占四百余典，宁属约二百典，其数量之多为江南之冠，这与苏州经济中心的地位是相应的。然而关于苏州典当业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鲍正熙同学在苏州档案馆查阅了清末至解放前有关典当业的大量案卷，潜心三年加以研究，揭示了典当业与近代地方社会生活以及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了近代苏州典当业衰落的深层根源等问题。

其后的三篇论文都是关于苏州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脚夫、绣娘和

女教师群体。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市民社会发育完善，活跃着各种社会群体。所谓社会群体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目的进行共同活动的人群。按照业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则是职业群体。学界对于明清以来苏州各类社会群体进行了研究，其中关注最多的则是明清以来苏州的功名士人，而居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群体则鲜为论及。

脚夫，是苏州以及江南地区从事中、短途挑运货物及民间婚丧嫁娶的扛抬，以其体力劳动换取报酬的一种从业人员的泛称。明清时代，伴随商品经济的繁荣、市镇的发展，脚夫的活动相当频繁，一些商业指南书对此已经有所提及，如明人《士商类要》中就指出“至于脚夫，无所不至，先指脚价，后设偷心”。到了清代，脚夫广泛分布于江南社会，关于他们“什伯为群”、“盘踞一方”等等记述，不绝于地方志书及碑碣中。申浩同学随我搜集整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时，发现有关常熟地区脚行组织的碑刻，后来他又大量翻阅了苏州地区的方志，也有不少关于市镇下层群体如脚夫、打行、访行等的记载。他有研究的兴趣，而这又与我倡导的社会史研究旨趣相契合，于是我们决定将脚夫、访行、打行这些下层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江南市镇中脚夫、访行、打行都是明代中叶以后受商品经济及其作用下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影响而出现的；都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有着很强的暴力色彩，处于一种进步与落后的矛盾之中。对于脚夫来说，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随时面临着失去生活保障的危险，往往依附于访行、打行等群体，借以保障自己的权益。脚夫、访行、打行的活动，实际都打着社会变迁的烙印，带有转型期的特点，反映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制度极其顽固的国度，阶段分化的艰难。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对人的发展的局限性越来越大，限制了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原先可能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脚夫、访行、打行的活动变质、异化。他们或流为秘密社会组织，或失去了团体性，而演变为一种无序的个体。清代以后，由于访行对统治秩序构成严重危害，受到严厉打击，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江南市镇中的地棍、讼棍。在这一点上，脚夫、访行、

打行群体的命运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遭遇相类似，他们都未能冲决传统社会加之于身上的枷锁，而是与其相适应，甚至同流合污，沾染上了浓厚的依附色彩，以至中途夭折，或发生了变质。脚夫、访行、打行构成清代苏州以及其他江南市镇社会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下层群体，是研究清代以来苏州与江南社会变迁需要关注的。探讨这些下层群体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苏州女性的角色作用和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明清以来的苏州才女群体颇为学界关注。我的二位硕士生王秀娟和王文娟则是眼界向下，关注普通女性职业群体，分别选择苏州绣娘和苏州女教师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苏绣是苏州传统工艺品，凝聚着江南山水人文之美，为世人所瞩目。绣娘是美的创造者，她们的社会生活究竟如何呢？秀娟不仅努力搜集史料，而且深入绣娘集中的镇湖作社会调查，还采访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娥瑛等。秀娟将苏州绣娘分为闺阁绣娘、乡村绣娘与专职绣工三种类型。专职绣工又分为官府专职绣工和民间专职绣工。三种类型的苏州绣娘，通过亲缘、地缘和学缘的形式进行技艺传承。同时，绣娘与绣庄、发放站等中间商、达官贵人、大商人、实业家以及文人雅士等有着广泛的交流。交流增加了她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她们的艺术品位。近代以来苏州绣娘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出现了分化与分层，面临着近代转型。苏州绣娘与苏州社会紧密关联，苏州社会的变迁决定了苏绣行业的盛衰和绣娘命运的沉浮。

苏州女教师是一个全新的女性职业群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促使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苏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中西文化在这里激荡交汇，造就了近代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教师。近代女教师群体与历史上的才女群体有什么不同？她们的家庭出身、文化素养、社会信仰、社会地位、社会交往如何？她们的穿着、婚恋、家庭、生活如何？她们的职业状况、业余爱好如何？女子学校的校规、课程是怎样的？如此等等，都是饶有兴味引人关注的。王文娟同

学有志于献身教学事业，因而这一课题深深吸引了她。文娟不避劳苦，在苏州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一些历史悠久的学校搜寻资料、访问女教师。在此基础上对苏州女教师群体作了总体上的把握和分析，进而从家庭和职场两个方面分别介绍了近代苏州女教师的生活，探讨了刚刚走上社会的职业妇女在家庭和事业方面遇到的两难选择。文娟还以近代苏州几位进步女性为例，追溯了苏州女教师与苏州地方社会的交往与互动，展示了近代苏州知识女性对于苏州近代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她认为职业女性走向社会，其以往的隐性贡献开始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本书第三部分三篇论文涉及街区、慈善与救荒。无论何种人群，都是安身立业于一个个具体的街区，研究苏州人的社会生活，自然离不开街区，这是城市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以为街区研究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将某个街区视为一个整体，要着力于揭示其整体特征；二是街区是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关系。王波同学有志于研究苏州的街头文化，我建议他将研究落实在一个具体的街区——观前，因为观前既是苏州古老文明的标本，又是近代文明的窗口。要求他从三方面加以考察：观前街区发展与苏州城市发展；观前文化与苏州城市文化以及观前居民与苏州城市居民等。最终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透视街区发展的历程阐述观前街区中心地位的确立；第二部分主要写观前街区的整体特征。王波指出：观前的兴起得益于西晋咸宁二年（276年）玄妙观的建立，玄妙观的兴盛带来了人群和商机，由观内而观外，逐渐形成了商市。传统时代的观前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功能区。近代以来，由于其居城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机遇、自身求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它由经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从而使中心的区位与经济、文化和社会中心的地位重合，成为苏州的中心街区。而街区的其他特征是由其中心地位派生出来的，商业的发达、金融业的中心是其第一位的；观前商业的发展推动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其日常的物质生活也逐渐发生

变化，各种服务设施逐渐兴盛，观前休闲饮食中心形成；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见闻的增广，市民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生活以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观前街区文化日趋活跃，中西文化交融，遂成为苏城之文化中心；上述种种因素的有力融合，推动了观前市民意识的觉醒，观前市民公社随之成立，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观前街区整体特征的形成是在与苏州城市的互动中实现的。王波对观前的研究，就不是简单、平面的街区介绍，而是有着历史纵深感的街区研究了。

苏州商品经济发达，市民贫富分化严重，因此慈善、救济事业是维护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自北宋范仲淹创建范氏义庄以来，苏州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具体来讲，苏州的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民间承担，民间的自救组织较为有力地补充了国家政权在社会慈善方面的缺失。宗族保障是苏州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地域性的善堂善会、业缘性的会馆公所也承担了重要的保障职能，它们与宗族组织鼎足而三，共同构成苏州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学界对明清以来苏州社会保障事业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的。对于苏州社会保障事方面的研究，有苏州留园义庄和苏州灾荒救济两篇论文。

留园义庄的作者是陆晓雯同学。她入学以后，开始涉猎一些关于中国近代民间慈善的学术论著。随着阅读的深入，对民间慈善尤其是苏州的宗族义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她在决定选题时，却是十分犹豫。因为通过解读地方志、家谱、义庄规条以及文人笔记等资料，进而对义庄的构成、膳族内容、功能和作用等的研究已是很为深入。我告诉她，上海图书馆最近开放了一大批盛宣怀档案，盛宣怀不仅是近代洋务派的代表，也是享有盛誉的慈善家，他的家族就拥有常州拙园、苏州留园两个义庄。盛宣怀有很强的档案意识，对自己经手事务的文件有保存的习惯，可以试着在其中挖掘新的材料，找寻新的视角和新的切入点。晓雯在大量阅读档案时，发现盛档里保存了留园义庄大量的月报清册以及留园义庄司事与盛宣怀的通信。内容涉及留园义庄的运行和多方面参与苏州社会生活的情况，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过去，义庄由于其宗族膳族组织的属性，没有

像善堂、善会那样会制作详细记载日常运作的征信录，以供社会上的集资参与者监督查看。在漫长的家族兴衰更替中，义庄的账册和活动记录难以保存，导致义庄研究长期只能停留在表面的规条和人事安排上，无法看清其真正的日常活动，更无法对义庄参与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进行深入地挖掘。更重要的是，盛档显示留园义庄既有和传统义庄在构成、管理和功能上的诸多共性，亦有受盛宣怀强烈的个人色彩与苏州近代社会变迁影响所产生的个性特色。有鉴于此，我建议晓雯，义庄研究的范围目前只局限于对义庄的发展阶段及其原因特征、性质、功能、作用和影响的探讨，对义庄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几乎很少涉及，你可以试着以此入手做深层地挖掘。以留园义庄为切入点来探讨传统事物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晓雯领会了我的意见，在还原出留园义庄日常管理与经营的一般状态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留园义庄与苏州社会经济发展、日常生活变迁之间的互动作了全新的探讨。

与民间的慈善事业不同的是政府的荒政。荒政是我国传统社会（1840年前）主要的灾荒救治方式，它由国家政权通过一系列救济法令、制度与政策措施来组织实施，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国家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灾荒频繁，水灾、旱灾和虫灾不断。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席卷了整个姑苏大地。苏州社会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对灾荒的反应，就不再仅仅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了，它还会涉及中央政府、地方官府、社会团体等。王庆国同学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模式来分析苏州地区的灾荒，阐明了灾荒发生后国家与地方社会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渡难关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苏州地区灾荒的原因、国家政府以及地方社会对灾荒的反应，认为近代以来随着新生阶级的出现和政府对社会认知态度的变化，民间力量渐趋增强，开始在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救灾、施善教化等方面尤为明显。民间力量的增强有效弥补了政府在救灾等方面的不足之处，从而出现民众受益、国家与社会双赢的局面。国家与地方社会共同承担灾荒，二者最终在苏州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其做法亦值得其